

现代社会、民主问题与比较政治学

——评《比较政府与政治译丛》

叶 颖

用比较的方法进行政治学研究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通常认为可以追溯到政治学的鼻祖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为了撰写《雅典政制》而搜集、比较一百多个古希腊城邦的政治与社会情况。这通常被认为是比较政治学的开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研究从探讨“什么是最佳政体?”这个问题开始。这既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传统下的古典政治学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又是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政治学比较研究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①此后,在西方世界,随着以众多城邦分立为特征的古希腊城邦体制为大一统的古罗马帝国体制所取代,基督教也在与各种信仰体系的斗争中胜出,逐步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导精神传统。基督教在成为西方精神世界之主宰的同时,也为这一时期内的政治学研究设定了基本的导向。政治学思考依然试图寻求最佳政体,但早期基督教的教父思想家们则已经通过“上帝之城”(Civitas Dei)的学说为政治学的上述问题确立了答案:上帝直接治理下的

天国是一切人间政治组织的模板,以信奉上帝的君主为首的君主政体因其最接近于这种天国而成为人世间的最佳政体,但其权威仅限于世俗领域。^②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世界政治地图的变化将众多非西方的政治社会推上世界政治舞台,进而进入西方政治学界、尤其是美国政治学界的视野。比较政治学作为政治学的子学科之一应运而生。回顾一下比较政治学在此之后的发展历程便不难看出,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历史实际上一直围绕着“非西方的政治社会如何融入现代?”这个问题而展开。无论是在比较政治学成型伊始即占据主流的发展主义,还是继之而起的文化主义和政治参与研究,以及作为发展主义的替代者而出现的各种学术流派,如依附论、世界体系理论等等,它们的问题意识始终在于解答上述现代化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某种方式服务于政治实践,或者为西方国家、其中首先是美国的对外政策提供参考和依据,或者为

* 叶颖,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邮编:100871)

① Leo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p. 17.

② Eric Voegelin, "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in *Modernity Without Restraint*,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 5,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anfred Henningsen.,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0, pp. 156—157, 174.

与西方国家针锋相对的政策导向提供理论上的说明与论证。^①

由于比较政治学在实践层面上的这种目的,它几乎从一开始就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以政治秩序的优劣、高低分别作为比较研究得以开展的前提;从事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学者,必须将特定形态的政治秩序,以及处于政治秩序背后、作为其理论支撑的相关政治观念与原则,视为较为优越的类型。这是因为,政策决定是政治实践的主要内容,而就政策决定而言,如果它没有将某种政治秩序视为较为优越、值得追求的秩序,那它也就失去了作出决定的理性依据,而成为盲目、非理性的决定。

这样,现代的比较政治学与古典政治学至少在如下方面具有一致性:二者都将“什么是最佳政体?”作为自身要加以探讨的首要问题。古典政治学在探讨最佳政体问题时,通常是以处于同一历史、文化传统中的一些城邦作为基本研究对象,比较它们在实行不同政体情况下的治理状况。当然,出现在古典政治学家视野中的也有与城邦完全不同的政治社会,例如位于东方的波斯帝国,以其作为比较不同政体优劣的范例。相比之下,包括比较政治学在内的现代政治学,尽管并不一定如古典政治学那样将“什么是最佳政体”明确地树立为自身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但是,正如我们上面所说,从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

来看,这个问题依然是现代政治学研究所无法回避的核心。与古典政治学中的比较研究相比,现代的比较政治学所要探讨的政治社会更加多种多样,涉及具有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政治社会的政体建构。但是,在表面上具有丰富复杂性的政治社会及其所引发问题的背后,比较政治学的主要目的依然在于通过对不同政治社会及其政权组织形式的比较研究,找出最适合于该政治社会的政体形式,从而回应上述“最佳政体”问题。

就研究方法而言,比较政治学首先要收集 and 了解不同政治社会的各种历史与现实状况,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因此,从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步骤上讲,研究者们首先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对当前这项研究而言,需要收集和了解哪些状况?或者说,哪些事实是与眼下将要开展的比较研究相关的?比较研究所面对的这种逻辑境况提示我们,有意义的比较研究必定是有着某种理论预设的研究。这种理论预设决定着研究者将要收集哪些方面的资料、从事哪些问题的研究。也就是说,这种理论预设不是比较研究的结果,而是比较研究的前提。

由于社会科学研究者在构建某种理论时所参照的价值并不是先验地决定了的,不同的研究者因而完全可以参照不同的价值,构建出不同的理论。比较政治学不同流派之间的争论,在很多情况下首先来自于各自所参

^① 关于发展主义(或称政治发展研究),可参见 Gabriel A. Almond and G. B. Powell, *Comparative Politics: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Boston: Little, Brown, 1966; L. Binder, J. Coleman, J. Lalapombara, L. Pye, S. Verba and M. Weiner, *Crise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关于文化主义(或称政治文化研究),可参见 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关于政治参与研究,可参见 R. Dalton, *Citizen Politic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2nd ed., Chatham, N. J.: Chatham House; S. Rosenstone and J. Hansen, *Mobilization, Participation, and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Macmillan, 1993;关于依附论,可参见 Enzo Faletto and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关于世界体系理论,可参见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照的价值之间的差异,来自于理论的构建者所要维护或者倡导的价值观的不同。在20世纪60、70年代,官僚—威权主义研究、依附论、世界体系理论在比较政治学中具有重要地位;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兴起,民主政体作为政治发展的方向、作为最适合于现代化进程的政府形式的地位被认为愈发不可动摇。在这种历史背景与学术背景下,当代的比较政治学将民主化问题,或者说种种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的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重心也就不足为奇了。

于是,我们看到,当今西方的比较政治学主流所认可与坚持的理论预设是,民主政体是最适合现代社会的政体。为了将这里所说的民主政体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其他一些民主政体区别开来,这种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之最佳政体的政权组织形式又被称为“自由民主制”(liberal democracy),其基本含义在于,这种民主政体很好地同时保障了人们在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两个方面的权利,从而有别于那些只偏重其中一个方面、因而带来种种危害的民主政体。

根据以上这些对比较政治学概貌的简要勾勒,我们在《比较政府与政治译丛》^①(以下简称《译丛》)这套丛书中看到,它基本上囊括了对学习比较政治学而言最主要的三个方面内容:比较政治学的学术史、当今比较政治学

主流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以及深入进行比较研究所必需的国别研究。《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一书对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历史进行了梳理,用主要篇幅介绍了比较政治学中的主要研究流派和路径,从政治发展研究、政治文化研究,到“对发展提出的挑战以及替代方案”,再到民主转型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所面对的发展问题和发达国家在经历了现代化发展之后所遇到的“后发展”时代的问题,林林总总,逐次予以评述和分析。^②

如前所述,将民主政体视为现代社会的最佳政体,是当代比较政治学主流所坚持的核心观念。在此基础上,比较政治学的主要任务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探讨现代社会中的民主政体在观念层面与制度层面的特性,二是探讨处于不同历史与文化传统之下的各个政治社会建立民主政体的条件与前景,亦即所谓民主化转型问题。当今比较政治学的这些特点在《译丛》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首先,《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以探讨世界各地的民主化转型为主题,包括民主化的现状、影响民主化的各种因素以及民主化的前景等课题。作为全书立论的基础,它在开篇和结论部分都提出和阐述了作者所认为的在现代社会具有普遍性的民主制度的特征,也就是将某些普遍性的民主核心原则与各个政治社会的特定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③全书贯穿着对于这种结合了普遍性与

① 这套丛书已出版的书目包括:[加]沃尔特·怀特、罗纳德·瓦根伯格、拉尔夫·纳尔逊:《加拿大政府与政治》,刘经美、张正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美]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榕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美]霍华德·威亚尔达:《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姜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美]施密特、谢利、巴迪斯:《美国政府与政治》,梅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美]霍华德·威亚尔达:《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刘青、牛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美]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非西方发展理论》,董正华、胥涛、郑振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参见本刊本期封三。

② [美]霍华德·威亚尔达:《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第三章至第八章。

③ [美]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第一章、第九章。

特殊性的民主制度代表着世界各地政治发展方向信念。正是以这种信念为前提,对于世界各地区的民主化前景(而不是“非民主化”前景)的比较研究才成为可能。其次,《译丛》中包含多部以国别研究为主题的著作,大都以某种民主政体理想作为比较研究所根据的标准,在对各国现有政体的研究中明显地体现出将各国政治制度的现状与上述理想标准进行对比的旨趣。

从民主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两个方面入手探讨民主化转型,这种思路表明,比较政治学试图克服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避免因为将与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有着密切联系的民主实践强加给有着不同传统的非西方社会而招致诟病。实际上,从探讨政治发展开始,比较政治学一直在寻找一条出路,以便能够将民主政体作为现代社会的最佳政体这一原则加以推广,在广大非西方的政治社会中实现民主。在西方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中,对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其意义就在于,这种研究希望通过把握影响着民主化进程的各种因素,对推动非西方政治社会的民主化进程起到一定作用。按照这种思路进行比较政治学研究,就不难得出《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一书的立论根基:民主化进程的成功,关键在于将某些核心性的民主原则与处于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下的政治社会的现实状况相结合。

然而,比较政治学的这些研究并没有解决民主化转型课题的前提问题:民主政体的“价值”究竟如何?或者说,民主政体究竟是不是现代社会的最佳政体?在《译丛》所收入的各种著作中,我们未能看到对于这个前提问题的论证。究其原因,恐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现实已经愈加促使人们将“民主政体是现代社会的最佳政体”这一命题接受为某种政治常识,以至

于无须在比较政治学教科书中对其进行论证。

但是,一项命题被接受为常识,这并不能保证它的正确,至少是不能使其拥有不受质疑的特权。既然对于最佳政体的探讨是政治学所面临的首要问题,那么,在整个政治学(而不仅仅是比较政治学)的范围内对当代比较政治学主流所遵循的理论前提进行探讨,也就是理所应当的了。尤其是,对于非西方的政治社会而言,探究民主政体对它们自身的“价值”或者说适用性,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

在这方面,回顾一下古典政治学在讨论相关问题时的视角或许是有益的。这种回顾可以帮助我们当对当今西方比较政治学主流所遵循的前提预设进行更好的反思,从而不仅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比较政治学的理解,而且能够对我们试图通过包括比较政治学研究在内的政治学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现代化环境中的国家构建问题——带来帮助。

在探讨什么是最佳政体时,现代政治学往往受到对其所给出的特定答案是否具有普遍性的质疑。例如,人们可能认为,民主政体只是对于西方社会与西方人而言是“他们的”最佳政体,但却不适合“亚洲文化”或者“亚洲价值观”。因此,为“民主政体是全人类的最佳政体”这一命题进行论证,或者将其作为隐含的理论前提的政治学研究就被认为体现着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人们甚至由此推论,由于政治现象与各地的历史、文化等传统有着密切联系,政治学所寻求的知识必然只能是地域性或者历史性的,人们不可能获得普遍有效的政治学知识。

但是,关于政治学知识之普遍有效性的观念是古典政治学的基本原则。古典政治学尽管是由古希腊人在古希腊城邦的环境中发

展起来的,但它认为自身所寻求的是对于所有人都普遍有效的真理。古典政治学家知道自己所处的希腊城邦的独特性,也知道世界上还有着与他们所在社会不同的其他政治社会,其生活方式与他们所在社会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①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将政治学研究的目标确立为寻求某种普遍真理,寻求某种对所有人而言均普遍适用的最佳政体。

值得注意的是,在古典政治学那里,政治学知识的普遍性与其说体现在它所给出的特定答案是对所有时代的所有人均普遍适用的,不如说首先体现在它所探究的问题是所有时代的所有人都会追问的问题。在柏拉图那里,“善的理念”(the idea of good)是最高的知识。将“good”称为或者译为“善”,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却容易掩蔽这一最高知识与浅近的日常生活经验之间的紧密联系——对“善的理念”的探求意味着追问“什么是善”(What is good?),而这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发问的“什么是好的?”实际上是同一问题。将人们的日常经验与哲人所寻求的智慧联结在一起的,或者说,令日常经验有可能成为寻求智慧所不可或缺之基础的,则是辩证法。与哲学经由其问题的普遍性而具备的普遍性类似,就古典政治学而言,由于它将“何为最佳政体?”作为自己探究的首要问题,而这个问题又是所有时代的所有人都必须寻求答案的一个问题,因而同样具备了普遍性。相比之下,古典政治学家对这个问题给出的种种不同答案本身的重要性反倒在其次,重要的是对根本问题的意识与不断探究。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按照古典政治学家本身理解古典政治学的方式来理解

我们所从事的政治学研究,那么,我们便可化解对政治学之普遍性的怀疑。这是因为,政治学所追问的根本问题(而不是任何研究者对这个根本问题给出的特定答案)构成了政治学知识的普遍性。因此,与人们常常抱有的误解正相反,尽管古典政治学家宣称自己所从事的是对普遍真理的探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政治学问题给出的回答必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必定是一些不同社会的人们都可以依据来建设各自理想国的现成方案。

通过回顾古典政治学对于各种政治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它关于政治学知识之普遍性的主张获得更为深入的认识。限于本文的主题和篇幅,这里无法进行这样的详细分析,而只能针对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主题——古典政治学对民主政体是如何评价的?它对这个问题探讨如何具有普遍性?——给出一些简要的说明。

在古典政治学中,尽管不同思想家对于何为最佳政体给出的回答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民主政体——其实质为“多数人的统治”——在古典政治学中从未被视为最佳政体。民主政体或者被认为是所有正常形式的政体中最差的一种政体,仅仅好于由正常形式的政体蜕变而成的种种朽坏政体,或者被认为只是最佳政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更确切地说,古典政治学实际上并不认为存在某种静态的、经久不变的最佳政体;相反,各种形式的政体,无论其相对的优劣程度如何,都不能摆脱蜕变与循环的过程。初看起来,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孜孜不倦地探讨政体的分类与优劣,然而,“政治形式的循环是(政体)分类问题的最终答案”,而

^① 例如,柏拉图和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均充分注意到波斯帝国的存在,以及波斯帝国所代表的与古希腊城邦完全不同的社会生活方式。

民主政体如果说具有某种意义上的优越性的话,那也只是由于“和平、秩序、繁荣、人口的增长以及财富的积累将导致最初那批立国精英的堕落,直到大众民主成为唯一具有历史可能性的形式”。^①

我们谙熟于将政治理论划分为注重个人的权利、自由与福利的“个人主义”流派和注重国家的权力与自由的“国家主义”流派,但在古典政治学中则很难作出这种区分。古典政治学的视角既非单纯着重于个人,亦非单纯着重于城邦、王国等政治组织,而是一种将人和社会都囊括在内的整全视角,着眼于通过政治学的思考来把握和实现整全的秩序。在这种整体性的秩序中,人们内心的内在秩序与社会的公共政治秩序都是其组成部分,任何一方的缺失都会导致整体秩序的缺失,而这又会使得那些业已达成的、部分性的秩序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就一种政体而言,即使它在实现公共秩序、增强国家权力这方面获得可观的成功,但如果它在增进公民美德、也就是增进公民的内心秩序方面存在不足,那么这种片面的秩序也将是不稳定的。^②

总之,如果说现代政治学,尤其是比较政治学时常遭遇到这样的质疑:政治学是否一

门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现代政治学对民主政体的推崇是否具有普遍意义?那么,在回顾古典政治学的整全视角之后,我们看到,由于政治学所研究的问题实际上与人对秩序的寻求直接相关,因而政治学并不仅仅是“对现行制度的描述以及对这些制度所体现的原则的辩护”,而是“关于人类在社会和历史中存在的科学,以及关于一般意义上的秩序原则的科学”。^③如果“寻求秩序”确实是人的普遍要求,那么政治学便因其所要探究的问题而毫无疑问地成为一门具有普遍性的科学。但是,它的普遍性并不体现在诸如将某个政治社会实行的某一套政治制度、或者某一位政治学家提出的某一套政体原则推广到世界上所有政治社会这样的行动或者观念之中,而是体现在通过以“什么是最佳政体”为核心的一系列追问而展开的对秩序的寻求之中。同时,古典政治学对于这个问题给出的最终答案初看起来是颇有些令人惊异的:并没有哪一种政体是绝对的、经久不变的最佳政体。政体的衰败,无论是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还是综合了上述三种政体因素的混合政体,都来自于实行这一政体的人所操持的秩序的衰败。^④政体服务于政治社会的秩序,这一点

① Eric Voegelin, *Order and History*, V. 3, "Plato and Aristotle",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 16,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ante Germino,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0, pp. 394—395.

② 关于内心秩序在实现人们社会生活的整体秩序中所起的重要、甚至是根本性的作用,当代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 1901—1985)有大量详尽的分析。这既包含在他对现代性所体现的灵知主义(Gnosticism)特征的批判中(参见 Eric Voegelin, *Modernity Without Restraint*,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 5,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0, 尤其是其中的“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又包含在他对成功抵制了灵知主义侵蚀的各种思想观念——按照沃格林的术语,对这里所说的“思想观念”更为准确的说法是,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的人们用来表达他们所体会到的秩序的符号化表达形式(symbolism)——的深入分析中(参见 Eric Voegelin, *Order and History*, V. 4, “The Ecumenic Age”,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 17,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ichael Franz,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0, “Introduction” and chap. 7 “Universal Humanity”)。

③ Eric Voegelin, “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p. 89.

④ 参见柏拉图,《理想国》,543a—576b。

是毫无疑问的。人们因而往往容易期望通过建立某种被认为有着突出优越性的政体来保证一个政治社会建立起恰当的秩序——民主制度的推广者所奉行的正是这一思路。然而,在古典政治学看来,这一思路恰恰是本末倒置的。对于一个政治社会的秩序而言,其前景并不像政体循环论给人的初步印象那样黯淡。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要为民主政体原则加上一些“因地制宜”的限定条件,以便使之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而在于如何从恢复个人的精神秩序着手来重建政治社会的秩序。^①

因此,尽管对最佳政体的探讨是政治学

研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但这却并非政治学的终极关切。换句话说,如果我们遵循了古典政治学从日常经验与日常问题开始的辩证研究过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对最佳政体的探讨引导我们关注政治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也就是如何建立政治社会的秩序这个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套关于比较政治学的导论性著作,《比较政府与政治译丛》为引导人们进入对政治学根本问题的思考准备了丰富的材料。当然,在认识到所要思考的问题之后还有很长的道路,而这些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则不能仅仅在比较政治学的范围内展开。

^① 参见 Eric Voegelin, *Order and History*, V. 1, "Israel and Revelatio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 14,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aurice P. Hogan,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0, "Preface".